

生物和理论化学研究。他亲自推动全国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促成了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系列会议。在彭先生倡议下成立了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协调组,由各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所轮流负责,两年一届。彭先生出任第一届组长时,笔者曾担任秘书。记得彭先生说过,这件事要一直做下去,谁也不许“独霸”,谁也不许“泡汤”。这个协调组后来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的一个专业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会议多年来也在全国各地轮流举行。

回顾理论生物和理论化学的发展,我们特别看到“得其人”的关键意义。理论物理研究所由于欧阳钟灿在生物膜液晶模型方面的出色工作,开始了理论生物学的新方向。后来又有其他研究人员开展基因组学和生物符号序列的研究。终于使理论生命科学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主攻方向之一。当年贝时璋先生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第一班毕业的施蕴渝在 1980 年代中期从国外深造回来,也受到彭桓武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经过多年努力,在合肥建立了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中心。至于理论化学研究,虽然彭先生曾亲自到北京大学开课,却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干将”,而始终未能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领域。

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本身的建设方面,彭先生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建所伊始,他建议不设研究室,而是自由组合,自愿合作。谁有什么想法,到黑板前讲述,由讨论而合作,写完文章就可以另行组合。虽然后来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还是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不过在理论物理研究所里,研究室一直形同虚设,不是“一级组织”。彭先生还反复强调过,研究生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

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国内极少的不设初级和中级研究职位的单位。一般说来,只有在“博士后”期间成绩显著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被聘任为副研究员。包括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流动人员,是研究工作的一支主力军。这也是理论物理研究所能够保持比较精干的队伍、没有沉重历史包袱和“分流”任务的原因之一。

1980 年代初,在关于“科研道德”的一次讨论期间,何祚庥请彭先生为全所研究人员做报告。彭先生特别谈了“科学只承认真理、不承认权威”的观点。此后从理论物理研究所出来的文件里,很少使用“权威”二字。我后来还据此向“科学时报”的记者解释过,希望报纸不要以科学界的权威自居。

彭先生不再担任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之后,一直从事研究和参加学术活动,特别是支持交叉科学的发展。他在为学术期刊审稿时,担心由于自己不明白而耽误了新科学结果的发表,往往打电话把作者请来讲解,有意见也当面指出。他主动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还曾给一些期刊、报纸写信,说自己这里发生了“信息爆炸”,请他们不要再赠阅各种材料。他曾多次主动提出,要办理退休手续。科学院领导请彭先生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他写信建议“理论物理所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后来,经院领导一再做工作,请他照顾全局(据说即使给名誉所长头衔,也有人不愿意退居二线),他才勉为其难、不再拒绝。

笔者只能算是彭桓武先生的一名“门外弟子”。在筹建理论物理研究所以来的近 30 年里,才同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聆听过一些教诲。“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先生的风范,一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敬祝先生健康长寿!

## 人民科学家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庆 承 瑞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今年欣逢彭先生九十华诞,我和大家,更确切地说,是和众多彭先生的弟子们一起,衷心祝愿彭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彭先生在学校时没有直接教过我,因为我生得晚了点。但我却早就从清华老校友那里听说了先生

的大名和他的种种逸事。比如说,先生在他的极富特色的数学物理课上,常常会给学生留下几分钟思考消化新讲内容的时间。这时,先生自己也不闲着,会在一旁悠闲地吃几粒花生米。如果有学生前来提出问题,先生会高兴地和学生讨论起来,并且给予学

生同吃花生米的奖赏。所以 听彭先生的课一点也不枯燥。但就是在这样宽松的一学年的课程中,彭先生将全部高等数学中线性的部分,极为精练地集中教给了学生。特别是告诉你在何种条件下,各种方法如何应用,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并终身获益。

我十分遗憾,未能赶上亲耳聆听彭先生精彩的数学课,但又十分荣幸地亲身领略到先生渊博而深厚的数学功底。记得一次是在碰到求解磁流体力学自由界面问题时,还有一次是在讨论某一类发散级数的收敛性问题时。两次都是在和彭先生的讨论中受到极大启发,最后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我知道有不少学生和我一样,在求解物理中的数学问题时,受到彭先生高明的指点。可是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先生除了科学上的造诣以外,对外文,特别是英文有极高的水平。理论所的很多人也许还能记得,彭先生能背诵不少英国著名诗人,如 Hamilton 的诗篇。其实,先生在拼字棋( scrabble )的游戏中也是高手。每年春节,我和秦旦华、黄韵去先生家拜年时,总要被留下来和先生对局几盘,大多数情况是先生赢。这不仅是因为彭先生掌握的英文词汇量大,知道许多古怪的生僻字。更妙的是,在看似一堆死棋,无路可走时,先生往往会只用一两个字母,出奇不意地给棋打开局面,一下拼出好几个字,当然一下就拿到高分,而我们往往是大败而归。

在和彭先生的交往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对待生活的高度积极而乐观的态度。一般人们往往在顺利环境中能对生活抱积极乐观的态度,一旦处在逆境或遇到困难时,要保持这种态度就绝非易事了。1999 年初,彭先生因眼疾住进了北京医院,诊断结果,是要摘除白内障并植入人工晶体。对于当时已是 84 岁高龄,且有多种疾病的彭先生,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手术。手术后,所里的同志去看他,我也去了,老人家精神很好。当问起他手术的情况时,彭先生告诉我:躺在手术台上,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仍然听得见医生护士们的交谈。主刀的医生中,一名是山东大汉,另一名是山西娇小的小姐。于是,听他们一面给自己做着手术,一面交换着具体操作的意见时,彭先生居然诗兴大发,作起词来。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 复明记(自撰调)赠师自安大夫

柳絮飞将尽,正值风和日丽。浮游楼前,盘旋廊面,沉扬集散都由气。升楼顶,手术室内,卧听双簧戏。胶东大汉声音爽,山西小姐

操作细。术前术后,老主任把关,令人心慰。病房护理有序,蛋白限量有准,卫生服务满人意。新秀成长靠实践,吸收经验多方计。祝师大夫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日深造诣。做一位广有作为的复明使者,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

这首词,如果从纯文学的标准来评点,也许并不是高水平的;甚而在彭先生自己诸多篇诗词中,也不算是好的。但这首词却深深地打动我,因为这件很小的事却典型地反映了彭先生对待困难,对待人生的态度。这些年,彭先生除了年事已高,不时总有些疾病的干扰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并非总是事事顺遂的,但彭先生总是泰然处之,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笑对疾病,笑对人生,这就是我们的彭先生。

先生对师长,对同事和学生,怀有深厚的感情。王竹溪先生是彭先生的老师,王先生故世以后,彭先生每年必去看望王师母。又因为知道王师母经济上不够宽裕,每年都主动给予接济,直到王师母去世。而且直到今天,彭先生和王先生的后人仍然保持着来往,尽管王先生的后人中并无一人从事与物理有关的职业。事实上,当 1995 年彭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奖后,就自己设立了一个基金。彭先生自己曾说:我自任这个基金的主席兼出纳,一切由我做去。每年定期向他所了解到的优秀的学生或同事,特别是家庭生活不够宽裕的,发放基金加以鼓励。其中对那些曾在实验室工作过,身体有所损伤,或受到一定影响的同志,尤为关切。例如以前曾是彭先生在清华的学生,后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黄毅英,彭先生就十分关心,惟恐她的医疗条件不够充分(黄毅英因为曾与放射性元素接触受到过超剂量的辐照)。直到黄毅英再三向先生声明:她的医疗条件和生活都不成问题,老人家这才放心。

在日常生活中,彭先生和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有交往。从路边下棋的市民,到家中帮助他处理家务的小保姆,彭先生和他们都谈天说地,没有通常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或自视清高的“毛病”。学生们说彭先生平易近人,愿意和他讨论问题,小保姆说“这老头儿随和,不挑剔。”我以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平凡的小事,彭先生向人们展现出心地宽广的人民科学家的风采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如此,我想这也许也是他长寿健康的重要原因吧!